

「新金門危機」？

從「解嚴世代」金門女性生命歷程解析*

劉香蘭**

收稿日期：2023 年 11 月 9 日

接受日期：2024 年 6 月 12 日

* DOI:10.6164/JNDS.202406_23(2).0002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及主編、編委會與執行編輯的協助。文中若仍有謬誤，筆者當自負文責。

**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E-mail: liu2013220@gmail.com

摘 要

近年來，金門出現不婚、晚婚與不生的「新金門危機」，既有文獻忽略金門處於雙重邊緣及制度突變的脈絡。本文運用質性研究方法，以生命歷程為研究原則，透過代內分化和多重分析，訪談十位出生於1992至2002年間的金門女性，從多層次架構捕捉年輕女性所處的特定壓迫。一、鉅視層次：歷史時期下制度突變，金門從軍事社會轉型到後工業社會，加大個人與家庭生命歷程差異。在單一領域時間序列制度的宰制下，以家庭、教育、工作的先後次序被形塑，去標準化生命歷程反映兩岸三地制度間關係；二、中介層次：前一階段人力資本影響勞動型態，代內階級分化，工作宰制私人生活；三、微視層次：繼承傳統使年輕女性在資本主義社會承受更強的制度間衝突，不婚成為一種集體抵抗，反映新型態的性別衝突。「新金門危機」的因應之道是需理解解嚴後所存在的特定制度間關係，加上閩南文化扮演的角色，方能建構新的性別契約。

關鍵詞：生命歷程研究、世代分析、金門學、婦女研究、冷戰研究

壹、前言

金門縣，位於九龍江口外，與中國大陸廈門灣口遙遙相望。它的歷史與定位，有別於中華民國任何一個縣市。它曾是明、清的軍事要塞，並與福建省泉州、漳州及廈門市列為閩南文化的重鎮。冷戰蔓延到東亞，引發國共內戰，蔣中正率軍撤臺並頒布戒嚴令，它被捲入冷戰後，成為熱戰場，躍上國際。1946年後金門進入戰地政務時期，並被「要塞化」，成為一個例外的存在（何欣潔、李易安，2022：67）。之後在對岸「單打、雙不打」的戰略下，過著數十年相當畸形的日子。1992年金門解嚴、2002年小三通政策實施，它成為新前線，從邊界到交界，被納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體系。白永瑞（2016：104-108）在《橫貫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中指出解嚴後金門處於國家、非國家之間，不僅是兩岸來往的實驗區，更是前往世界的大門。然而，2008年大三通政策的實施，讓它頓失優勢。金門的地位，從冷戰的要塞、冷戰後的新前線到淪為邊緣，金門一直處於「雙重邊界」狀態（何欣潔、李易安，2022：77）。交雜國界和隱形的界線，使它的處境與經驗難以被島外的人理解。¹ 近年，在國內訴求「臺灣認同」、臺灣獨立下，金門更被臺灣邊緣化，處於雙重邊緣化的位置（宋怡明、李仁淵，2009；宋怡明，2016：326-327），² 金門的發展隨世界局勢左右，一直是恐怖平衡的核心。

也因金門位置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獨特，形塑島民特定的生命歷

¹ 金馬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的水域之內，等同於臺澎金馬共同體之間的海上飛地（行政上屬於甲地，所在地位置卻屬於乙的地區），這是一個獨特現象，不僅讓金馬與臺澎存在隱形界線，更使金門成為中華民國展現合法性的核心，金馬造就臺灣，延續可以反攻的幻象（何欣潔、李易安，2022：77-78）。

² 雙重邊緣化是指中華民國在臺灣為主體的論述下被邊緣化，金門更加被臺灣邊緣化（宋怡明，2016：326-327）。

程。戰地政務時期前（或稱為僑鄉時期），因島上資源貧瘠，男性「落番」下南洋謀生，島內以婦孺為主（沈惠芬，2011），形成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化生命歷程。戰地政務時期為能反攻大陸，島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軍事動員，建構與臺灣不同的生命歷程架構（劉香蘭，2022），以軍需為中心重組生產與再生產的勞動（江柏煒，2017：164），女性走出家庭從事出操和經濟生產，其生命歷程樣態已有變化（劉香蘭，2020）。

解嚴，引發金門制度突變，社會以高速率、高變異、高張力變化。金門家庭變化與臺不同之處是金門家庭變遷壓縮性較強（劉香蘭，2019a），尤其小三通措施實施的十年內，金門出現後工業化社會特徵，如家庭規模變小、不婚、晚婚、少子女化，2016年金門初婚率甚至是全國最低，³ 迸發失業（莊煥寧，2002）、未婚懷孕（翁碧蓮，2002a）、青少年藥物濫用（李增汪，1994）、老年照顧（翁碧蓮，2002b）等多重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就業率翻轉 13%（劉香蘭，2018），這些現象已顛覆閩南家族重視子嗣、遵守族規的文化傳統，對金門家族來說，這可能是史上最重大的危機。

Esping-Andersen (1990, 2002) 指出後工業社會浮現不婚、不生等現象，需重新省思性別關係和存在的性別衝突。「新金門危機」（New Kinmin Crises）攸關島上閩南家族的變遷與發展，需要放在冷戰結束後戰地的特定變遷過程中去理解。既有金門學和冷戰研究忽略「後追」後戰地社會的變遷以及理解冷戰持續的影響力，本文企圖從解嚴後出生在金門女性的生命歷程，窺見金門不婚、不生存在的特定動力和根源。

「新金門危機」是參考兩個概念，一是李世德（2017）著《金門危

³ 臺灣的家庭變遷自 1995 年起是婚姻與生育行為的變遷，在 2002 年後出現家庭結構更加多元化。金門家庭變遷主要是從解嚴後到 2002 年，先浮現婚姻延後、生育率降低與女性工作人數增加。2008 年後則是改以家庭組成的變化，如隔代、單親與新住民家庭比例較多，家庭組成更多元化。

機：1950年代美國外島政策》，「金門危機」指冷戰蔓延東亞，引發多次臺海危機下金門存亡的危機，強調軍事驅力；二是 Bonoli (2007) 提出「新社會風險」(New Social Risks, [NSRs])，強調成人處於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工作貧窮和家庭關係不穩定，是全球化造成產業結構重組及家庭組成流動使然(林萬億，2009)，強調經濟驅力。「新金門危機」的「新」，是縣府以觀光立縣，以市場做為唯一解決發展的途徑，金門被納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受地緣政治產生的失衡和不平，則反映在性別衝突之上。有別於軍事趨力的「舊」危機，是源於冷戰下國家間的軍事衝突，「新金門危機」是將國際分工和不平等再現於家庭與性別關係中，與市場經濟連動下增強工作、理性、自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以改變女性在工作與婚育的選擇順序、工作與家庭協調的邏輯等。「新金門危機」發生在戰地、閩南家族為主的金門，是否為非預期變遷？本文並不否定縣府經濟和福利政策的努力，只企圖透過冷戰後戰地社會的後追，藉由出生於後戰地金門女性的生命歷程，發現冷戰持續的影響力、新的地緣政治下特定之機會與壓力，如何與閩南家族主義互動，爆發「新金門危機」，豐富生命歷程研究和冷戰東亞相關研究。

貳、生命歷程理論與文獻檢閱

生命歷程理論關注行動者和社會結構的連結(Krüger, 2003: 48)，掌握人類生命長期的經驗。生命歷程理論強調生命歷程是社會建構，其發展已歷經幾個階段(Mayer, 2004)，⁴ 保持關注世代、重視國家與

⁴ 形成(初階)階段始於兩次大戰間，受發展理論和心理學的生命週期理論影響，關注世代。第二階段(1940s-1950s)更受心理學影響，關注人的內在，出現年齡分化的概念(age differentiation)。第三階段(1960s-1970s)重視文化、社會組織對生命歷程的影響及生命歷程的變異。第四階段(1970s-1980s)企圖掌握生命歷程在特定社會內和社會間的樣態，重視歷史比較和跨國比較。

制度的角色，朝向掌握社會內（間）對照的發展。1990年起因人口老化和家庭型態轉變，去標準化生命歷程樣態浮現，個人史與社會經濟脈絡的連結備受重視（Kok, 2007），加上福利國家發展不同的制度脈絡，國家與制度的角色成為重要焦點。

生命歷程理論有兩個知識傳統，一是歐陸傳統，二是北美傳統，歐陸傳統關注國家政策與制度形塑「制度化」或「常態化」生命歷程架構（Marshall & Mueller, 2003: 3-24）。北美傳統則採取微視觀點，關注個人在壓力結構下的生涯選擇與地位轉變，以軌跡、「階段變遷」（transition）、生涯、社會時間、累積的優勢與劣勢為主要概念（劉香蘭，2015: 21）。此兩派互相影響，促進微視與鉅視脈絡的連結（Marshall & Mueller, 2003: 3-24）。現代社會因制度分化，個人生活在不同領域和制度脈絡，制度間關係如何影響生命歷程讓歐陸學派成為有力的視角。

一、核心主題：強調歷史時間與人類生命的互動

生命歷程理論有五個核心主題（Elder, 1994），包括「人類生命與歷史時間的互動」（the interplay of human lives and historical times）、「年齡規範」（Age Norm）、「生命的時機」（the timing of lives）、「相依或互賴的生命」（linked or interdependent lives）和「選擇的能動性」（human agency in choice making）。人類生命與歷史時間的互動強調不同世代處於不同歷史脈絡，有不同的壓力與機會。世代（Cohort）指出生於同一年代的群體，即出生在相同時間的人（Elder & George, 2016），經歷相同歷史事件與重大社會變遷（黃芳詒，2016）。世代與歷史事件可能產生兩種效應，一是「歷史效應」（History Effect），指歷史事件對同一年齡層的人有相同影響，二是世代效應，指歷史事件對不同世代有不同影響（Elder, 1994）。世代分析可掌握歷史事件在同代和不同世代的影響，如 Glen H. Elder Jr. 著《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⁵ 追蹤兩個不同世代，連結戰爭、戰後制度發展與世代的關係，窺見歷史事件和人類生命的互動（Krüger, 2003: 48）。

年齡規範指人類對每個年齡階段發生的事件有相關的社會價值觀或信念，代表是何種特定的行為在特定的年紀應該或不應該發生（黃芳誼，2016）。相關概念包括「年齡結構化」（Age Structuring）、「年齡階段」（Age Phrase），⁶ 為此，年齡階段的劃分就相對重要，形成年齡階段特定的機會與壓力。如我國 7 歲到 12 歲的兒童須接受國民義務教育，是國家打造兒童基本公民意識與素養的制度。生命的時機強調年齡與時期，如生於戰亂，經驗死亡和苦難，生命經驗顯然不同於生於太平盛世。從生命歷程理論觀點，年齡是社會時間，繫於社會規範中特定位置（Mayer, 2009）。相依的生命是關注人的連結與依附，此超越家庭的視野，重視家族網絡與其結構變遷（Elder, 1997）。金門以閩南家族為主的社會結構，到戰地政務時期大批軍隊進駐，軍委會拔擢金門年輕男性擔任村里幹事，分化原本以長老為主的家族結構，更實施連坐法讓家族彼此監督，閩南家族被軍事化（江柏煒，2017：88），家族網絡內權力與關係的改變，是相當重大的社會變遷。主體能动性強調人的生命歷程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讓人與眾不同，Liu (2020) 描述一

⁵ 一是奧克蘭（Oakland Cohort）世代，生於美國戰後，歷經戰爭後經濟蕭條；二是柏克萊世代（Berkeley Cohort），生在經濟大恐慌，後搭上美國教育發展，此書揭開生命歷程觀點強調世代分析，關注行動者生命歷程和社會變遷的鑲嵌（Elder, 1974）。

⁶ 年齡結構化可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年齡結構化，是指國家是否存在以年齡為基礎規劃社會成員角色的制度，形成年齡規範，規範特定年紀被期待發生的事件或行為，非正式的年齡結構化通常在小團體或個人，依據年齡組織日常生活的事件（Settersten Jr, 2003）。年齡階段（age phrase）是年齡間隔（age-graded segment），各年齡階段存在特定機會與壓力，如何細分年齡階段反映社會變遷，受社會經濟的影響（Shanahan & Mortimer, 2016: 7）。

位金門女性「離經叛道」的歷程，Su 在婚後體驗金門媳婦的卑微，在戰地政務時期忍辱向學並考上公務員，解嚴後分居，退休後有穩定的職業保障，投入社會參與，其堅定意志力和資源的動員力，讓她與同代女性有不同的生命歷程。

二、生命歷程與制度鑲嵌性：

生命歷程體制和制度分類的類型學

歐陸學派重視國家與政策如何形塑生命歷程，尤其福利國家使生命歷程更具特性 (Mayer, 2004)，透過不同領域的制度讓人生活在多重領域的制度環境，使生命歷程理論自 1980 年中到 1990 年代關注「人在制度間」的樣態，掌握「制度間關係」(in between) 和其中的複雜性 (Krüger & Levy, 2001)，捕捉特定 (或數個) 歷史時期下跨國或跨社會生命歷程體制之異同 (Mayer, 2004)，掌握生命歷程與制度鑲嵌性 (Kruger, 2003: 48)。

Mayer (2004) 發展「生命歷程體制論」(Life course regime)，關注特定歷史階段的生產方式如何形塑不同的生命歷程架構，如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福利國家和後工業社會有不同的生命歷程體制。尤其在工業社會，國家建構教育、工作與退休常態化人生架構，形成年齡規範，讓群體出現相似行動邏輯與次序，達到社會穩定與發展 (Kohli, 2007)。在後工業社會，後福特主義下，去標準化勞動型態的出現，使個人與家庭生命歷程從標準化走向「去標準化」(de-standardization)，是存在個人化生命經驗與彈性生活安排的現實 (Heinz, 2003: 73-90)。此外，歐陸學派也重視個人或群體生命歷程如何受前一歷史階段的影響 (Mayer, 2004)，制度的比較不只是跨社會，更包括跨歷史期間的比較。

既然歐陸學派重視制度的角色與作用，制度如何分類？有學者依制度存在的邏輯與功能將制度分為三類，分別是「單一時間序列的制

度」、「串聯或平行的制度」、「毗鄰的制度」(Krüger & Levy, 2001; Krüger, 2003)。⁷ 金門在戰地政務時期建構軍事化時間序列制度，解嚴後才先後發展「串聯或平行的制度」、「毗鄰的制度」，使金門制度脈絡異於臺灣，形塑出生於臺灣、金門的同代女性不同的生命歷程樣態，顯示制度脈絡與制度間關係的影響(劉香蘭，2022)。因「串聯或平行的制度」、「毗鄰的制度」攸關於女性在工作與家庭領域的參與樣態、照顧勞動的重分配，影響女性領域參與的質量，在金門形成特定的制度間關係直接影響「新金門危機」的發生與動力，是冷戰結束戰地社會變遷後迫的研究方向所在。

簡言之，金門經歷數個重大歷史時期和社會變遷，制度脈絡與制度間關係如何影響女性生命歷程，在戰地政務時期的女性生命歷程樣態已有耙梳(呂靜怡，2014：160；劉香蘭，2020)，繼續「後追」後戰地社會女性生命歷程的樣態，才能窺見前一歷史時期的遺緒和新的地緣政治所形塑的制度脈絡，如何影響解嚴後出生於金門女性的生命歷程。「新金門危機」是從金門角度出發，從女性經驗窺見在金門面對世界競爭、兩岸三地的拉扯及閩南家族重男輕女的傳統，女性如何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安身立命」？雖然臺灣或其他國家也經歷少子女化、不婚和晚婚等新型社會風險，但金門是從軍事化躍進後工業社會，加上位置、文化的殊性，做為冷戰「後追」的案例，方能呼應東亞冷戰研

⁷ (1)「單一時間序列的制度」(Single Life-Sequencing Institutions)：是與年齡相關的安排、立基取得邏輯、有先後次序，先前參與領域經驗影響後面領域的參與，形塑人自出生到死亡，先後在不同領域的活動與事件(Mayer, 2004)。(2)「串聯或平行的制度」(Tandem Institutions 或 Parallel Institutions)：個人可能同時參與的領域，如勞動市場與家庭，兩者是互相影響的領域，受相依生命網絡和性別區隔的規則影響。(3)「毗鄰的制度」(Shadow Institutions 或 Adjacent Institutions)：一群毗鄰工作與家庭的體制，分攤家庭、國家和跨代的照顧責任，此對個人參與多重領域具調節作用(馬慧君、張世雄，2006)。如福利國家政策與福利設計、商業、醫院、學校、托育中心等。

究看到文化與女性經驗的浪潮。

三、文獻檢閱

生命歷程研究重視長期性，以「紮根於集體脈絡的脈絡」(in the context of collective contexts) 為特性 (Mayer, 2009)，世代研究是生命歷程研究的特色，目前已發展出科學化與標準化架構，發展跨國比較研究。

世代研究有兩個取徑，一是「代間觀點」(inter-cohort perspective)，透過代間比較連結社會變遷；一是「代內觀點」(intra-cohort perspective)，透過「世代分化」(intracohort differentiation) 掌握社會變遷對同代群體的影響 (Dannefer, 1987)，關注族群、性別、階級差異 (Elder & George, 2016: 59-60, 62-64)。代間比較被廣泛運用 (Dannefer & Uhlenberg, 1999: 306; Kelley-Moore & Lin, 2011)，世代分化的策略仍有發展空間。世代分化可用多層次分析進行 (Dannefer, 1987)，一是鉅視層次，運用壓力事件分析同代差異是否隨年齡增加 (Bengtson & Allen, 1993) 或用「世代－歷史分析」(cohort-historical analysis) (Elder & George, 2016: 63) 掌握社會變遷造成代內差異，發現「累積優勢和劣勢的機制」(cumulative of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Dannefer, 2003)；二是組織層次，經濟制度相關作用、勞動市場的區隔，影響個人領域參與和資源分配的多寡；三是微視層次，面對面互動如何形塑機會與壓力而影響個人行為，尤其人際互動存在的壓迫 (Payne, 2005: 262)。

檢視本土生命歷程研究，跨代研究以臺灣為主，⁸ 代內分析偏重

⁸ 跨代研究包括馬慧珍與張世雄 (2006) 透過次級資料勾勒不同世代女性生命歷程的變化，林津如 (2007)、劉香蘭 (2015) 以質性研究研析臺灣不同世代女性在照顧與工作的關係，連結社會變遷。

戰地政務時期的金門（劉香蘭，2022）。劉香蘭（2020、2022）運用代內分析討論出生於冷戰時期金門的同代女性、金門和臺灣同代女性生命歷程的異同，偏重鉅視層次分析。既有戰地金門女性的文獻強調文化作用，認為閩南文化的性別關係在不同歷史時期可能有不同樣態（周妙真，2009；呂靜怡，2014），現代化浪潮可能影響女性婚育意願和行為（Chiu, 2023）。從既有戰地女性同代分析的研究，看到分析視角的局限性和缺少後追（探索後戰地出生女性生命歷程的探索）造成的學術缺角。

為此，探索生於後戰地金門女性之生命歷程，既可在時間上與戰地政務時期女性生命歷程樣態作對照，窺見上一歷史時期遺緒的影響，也能捕捉現代化的制度脈絡對無經驗戰爭的女性之影響，捕捉閩南父權體系在不同歷史時間和其他制度的關係與互動，發現「新金門危機」特定的動力與根源，填補東亞冷戰研究忽略離島女性觀點的缺口。

參、研究設計與研究過程

立基於生命歷程研究的精神，重視歷史和脈絡，本研究以出生於1992—2002年的金門女性為主，稱為「解嚴世代」。選擇1992至2002年是因金門解嚴時，同年頒布「金馬安撫條例」箝制金門發展，該條例被認為是「二次戒嚴」，讓金門處於體制斷裂（宋怡明，2016：266）。在此時間出生女性具有特定的金門經驗，而她們成長於小三通措施實施後，在後工業社會中工作，她們生命歷程呼應金門重大變遷。

深度訪談法是蒐集資料的主要方法，理解參與者的主觀感受與經驗。資料蒐集歷程是獲受科技部（現國科會）專題研究補助，經臺大倫理研究委員會研究倫理審查，透過個人網絡引薦參與者，⁹在說明

⁹ 專題研究為兩年期（倫理審查編號為201705ES041）。作者在金門工作數年，深知

研究目的、告知研究倫理，簽署研究同意書後，於 2018 年 8 月到 2019 年 3 月間進行訪談。訪談多在餐廳，每位至少一次（3 小時），訪談同時錄音。訪談方向是生命史、家庭與工作、教育和特殊事件及相關制度的關係（如離島保送條例、離島加給措施等）。

她們基本資料如表 1。10 位參與者，出生於 1992 至 2002 年，訪談時平均年齡為 25.6 歲，從其地理分布、原生家庭維生方式、參與者教育與工作，助於分析解嚴後金門各區變化、家庭如何因應去軍事化、新地緣政治對女性生命歷程的影響。以下分別說明：

表 1 參與研究者基本資料

編號	原生家庭	訪談時學歷	訪談時工作	伴侶狀況
S01	父母：金門人	高職畢	餐飲店兼保險	已婚
S02	父母：金門人	大學畢	個管師	有男友
H01	父母：金門人	大學畢	教保員 / 保母	未婚
A01	父母：臺灣人	餐旅系四年級	餐飲店	無
A02	父母：金門人	大學畢	自營店	有男友
T01	父母：金門人	表演藝術相關學系四年級（中國）	中國打工	無
T02	父：金門人 母：臺灣人	高職肄	店員	單親媽媽
X02	父母：金門人	大學畢	社工員	有男友
X03	父：金門人 母：東南亞國籍	大學畢	幼教老師	無
B01	父母：金門人	大學畢	旅行社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金門人際網絡的綿密，參與者多是作者任教的在地學生推薦，透過電話聯繫，見面說明並取得同意。

首先，5 位生於金城鎮、3 位金湖鎮、2 位金沙鎮、1 位生於烈嶼鄉，不同區域參與者的經驗反映金門在不同歷史時期下的區域變遷。最先訪談是生活在烈嶼鄉的 S01，烈嶼鄉一直維持農漁業生活，人口外移和人口老化相當嚴重，從她開始資料蒐集助於理解「離島中的離島」的女性處境。爾後從金城鎮、金湖鎮、金沙鎮依序訪談，金城鎮在戰地政務時期是主要商業區（周妙真，2009：43），現在是市政與議會所在地，鎮內產業多元且鄰近金門大學，有較多外來者；金湖鎮設有機場、署立金門醫院、住宿型長期照顧機構、大型賣場和百貨公司，重劃區有較多外來人口；金沙鎮人口少、人口老化嚴重，維持傳統手作、糕餅業（劉香蘭，2018）。

參與者家庭反映後戰地金門人口的遷入產生家庭的異質性。為利於分析，以族群將 10 位參與者分兩類，一是跨國、非閩南族群家庭（3 位）：A01 父母是臺灣人，父親在解嚴後到金門工作，母親依親。一位是跨國婚姻的家庭（X03），母親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T02 母親是臺灣人，與她父親在臺認識意外懷孕，嫁到金門。二是父母皆是金門人（7 位，S01、S02、H01、A02、X02、B01、T01）。T01 父母從在臺灣認識結婚，解嚴後搬回金門，其他其他參與者父母則長年住在金門。

此外，原生家庭維生方式能提供去軍事化時家庭變遷的資料。5 家在戰地政務時期曾做阿兵哥相關生意（S01、S02、H01、A01、B01），解嚴後開店有 4 家（H01 父親改作吊車、A01 父親做國際貿易和自營餐飲店、A02 父親開裝潢店、T01 父親賣簡易餐食），其他父親兼任不同性質工作（如計程車、水鐵工、救生員），只有 X02 父親是水電工，穩定受雇。從父母工作型態窺見參與者家庭相當多元。

最後，10 位女性的教育和工作凸顯兩岸三地產業發展與人才拉扯的現況。1 位高職畢（S01）、1 位高職肄（T02）、1 位在臺灣念大學四年級（A01）、1 位在中國念表演相關學系（T01），其餘大學畢業。研

究時，2位在念書，8位從事服務業，如托育工作者、社工員、教保員、個管師、寵物照顧、旅遊業、保險、商店，只有A02自營寵物店。2位因未婚懷孕倉促結婚，其中1位已離婚。

資料蒐集和分析是並進的過程，將訪談稿轉譯為逐字稿，透過開放性編碼做年齡、事件、領域的歸類，關注歷史時期下重大事件（原因—歷程—結果）的分析，運用Dannefer (1987) 世代分化多層次分析策略，分析女性參與領域的先後、數量、參與度和資源 (Krüger & Levy, 2001)，掌握「相關制度的多重性和制度間相關性」(the multicity of relevant institution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從單一個案分析到跨案對照，發展概念，浮現主題，形成「新金門危機」的論述。

肆、研究發現：「雙重邊緣」金門下的「新金門危機」

解嚴後的金門處於兩岸三地的交界，在新的地緣政治下，諸多的超國家、國家力量形塑它的雙重性。一是冷戰後區域政經網絡的形成，臺灣加入WTO後，進口酒取消關稅，連動白酒市場的競爭，金酒專賣的優勢不再，金酒民營化後更受縣府和中央雙重管制，影響金門經濟甚深 (羅志平，2010：397)；二是國內政策讓它的位置從要塞淪為邊緣，2002年小三通政策讓它成為新前線，2008年大三通措施讓它頓失優勢，它的發展受政策左右。三是臺獨運動在臺灣的種種論述，讓金門人感覺被遺棄 (何欣潔、李易安，2022：133)。四是中國、廈門對金門祭出各種優惠政策，不僅被列入海西區發展架構，對岸旅遊優惠將金門人等同於廈門「超國民」的待遇 (邱莉燕，2018)，這些種種劃界政治讓金門面對的壓力與機會實有異於臺灣其他縣市。如同解嚴後金門第一任縣長深知經濟發展是唯一出路 (宋怡明、李仁淵，2009)，出生於解嚴後戰地的女性經驗到兩岸三地的制度關係如何形塑生命歷

程，她們生命歷程如何反映超國家、國家和金門傳統的力量？

一、鉅視層次：歷史時期交替下的制度突變與家庭分化

宋怡民（2016：265-267）指出從未實施過憲政的金門，何來「恢復」憲政之說，軍方和縣府的制度連結不存在、軍隊撤出產生經濟危機及「金馬安撫條例」如「二次戒嚴」箝制金門，激發金門民主運動。2000年總統頒定「離島建設條例」，¹⁰ 創造離島特定機會，臺灣人、臺商和在臺灣的金門人聞風小三通政策，增加金門的人口流動，小三通政策讓金門門戶大開引發跨國遷移，後戰地社會人口逆勢成長，改變金門社會與家庭組成（劉香蘭，2019a）。

（一）戰地政務時期的壓抑轉為解嚴初期的社會壓力

10位女性的幼年經驗反映後戰地社會、家庭與人口變遷，以族群粗分，一群是「純」金門人結合的家庭，另一群是跨國和跨文化的組成，在多元、異質下存在族群階層化：

媽媽因為在她的母國只有國中學歷，她是爸爸到臺灣認識，後來就嫁到這，一開始她不會說閩南語，她是長媳，一直跟整個大家族住在一起，阿公阿嬤、三個叔叔跟我爸爸，所有的小孩都住在那裡，很多人住在那裡，叔叔都生3、4個，她很辛苦。我幼稚園才搬到金城，媽媽開始去工作，她的妹妹也嫁到臺灣，我的小叔叔也是娶外配，是另一個國家的。（受訪者 X03，2018/12/28，當面訪談）

爸爸是做水電工程，媽媽是跟阿公阿嬤做小吃，那時是與阿公阿嬤住。媽媽是臺灣人，被爸爸虐待多年，金門很封閉，因為懷了我才嫁過來。她那時候是學生，媽媽也是沒有讀完，

¹⁰ 參考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121> v.tw。

她也不愛讀書，想出來上班，因為外婆那時候被跑會，媽媽出來幫忙賺錢。(受訪者 T02，2018/12/28，當面訪談)

因為不是本土金門人，也不是很有錢，本土金門人有很多地，我們什麼都沒有……以前媽媽又倒會，經濟出現各種困難，媽媽就說那時候口袋只剩下 20 塊錢，我小時候被送回臺灣養一年多，我跟阿嬤感情就很好，家裡很辛苦，房子要捐房貸、車貸，店面也是租的，生活很辛苦。(受訪者 A01，2018/08/20，當面訪談)

X03 生長在跨國家庭，母親來自東南亞國家，在閩南家族擔任長媳，學習語言，承擔所有家務和照顧責任，也因是外國人，承受相當嘲諷，母親的妹妹也嫁到臺灣，叔叔也娶外籍配偶，家族組成因多國籍而有所改變。T02 家是臺灣人與金門人的組成，父親到臺灣結識家庭經濟危機的未成年女學生，意外懷孕，倉促成婚，母親嫁到金門後幫忙顧店，長期受到家暴。跨國家庭、跨族群家庭是前一歷史時期（戰地政務時期）性別比例失衡及人口老化的壓力，產生特定男性難以娶妻的隱憂和家庭照顧人力不足的問題，在解嚴後爆發傳宗接代和照顧危機，家庭只能尋求外援（劉香蘭，2019b）。小三通政策實施前，在金門的外籍配偶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小三通政策實施後，兩岸聯姻數增加，2005 年後來自中國的新住民人數高於印尼、越南（金門縣文化局，2009：354），金門社會和家庭組成的多元，反映世界體系的區域分工，金門、臺灣、中國、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日趨鑲嵌的結果。

A01 是父母都是臺灣人，解嚴後到金門開店，走向國際，經歷倒會風波，加上各種貸款，引發家庭經濟危機，母親將她送給臺灣外婆照顧。從她的分享窺見金門人有「在臺灣混不下去的人，才會來金門」的偏見，讓在解嚴後來自臺灣的外來客之一舉一動受鄰里議論，這是臺灣、金門在長期發展失衡下，建構出特定的刻板印象，使 A01 家處於社會邊緣。

其他 7 個金門人組成的家庭，內部存在異質性。受雇 1 家 (X02)、阿兵哥生意 3 家 (B01、S01、A01)、3 家父母自開店 (T01、A02、H01)。閩南家族內是年齡與性別交織的階層，以男性長者為中心（如 X02 家以阿公為中心），謹守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禮數。B01 和 A01 家做阿兵哥生意，門庭若市，從小幫忙顧店。S02 的母親是養女，女孩在閩南家族一直被視為負擔，貧窮家庭更養不起，不是溺女，就是或送或賣給有錢家庭（陳支平，2004：152-153），種下養女的苦命：

媽媽是養女，她 18 歲就嫁給爸爸，養父很愛賭，13 歲她就出來學剪頭髮賺錢，18、19 歲的時候認識一個男朋友，是臺灣人，養父很生氣，妳如果去臺灣，我們就切斷關係，她非常重感情、也孝順，捨不得離開養父跟阿嬤，就選擇留下來，養父就找一個很窮的，又年輕的人結婚，那就是我爸爸。（受訪者 S02，2018/09/02，當面訪談）

金門婚姻大事多由父母決定，更何況 S02 與臺灣男性相戀，觸犯族群界線，凸顯養女毫無人身自由、個人意志，S02 公公隨便找一位金門年輕男性入贅，是希望透過男丁入贅，避免絕嗣（陳支平，2004：154），簽下入贅協議，姊妹 4 人，2 位跟母姓、2 位跟父姓，足見重視男性子嗣的閩南家族，女性被物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未生下男丁的媳婦，無法在家族立足，使她從小飽受言語傷害。父親到酒店尋歡，外遇不斷，顯示社會對男性「尋花問柳」的包容，女性未生出男性子嗣更將男性出軌予以合理化。

解嚴後金門是交界區，戰地政務時期人口與性別比例失衡成為解嚴後金門社會的壓力，為解決缺工和家庭再生產的壓力，移入不同國籍、不同族群的女性，改變社會與家庭、宗族的組成，形成以閩南族群為中心的族群階層。來自臺灣、東南亞國家的女性隻身進入閩南家族網絡，她們離開家人，依附在陌生的宗族系統，這種相依生命網絡的重組，牽動社會關係的改變（Findlay et al., 2015），她們在閩南家族

內地位最卑微，在社會被歧視。臺灣與東南亞跨國婚姻形式的市場，附著於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發展特定的經貿關係，沿著男尊女卑、男大女小的文化腳本，讓貧窮國家的年輕女性透過婚姻進入處於弱勢的男性家庭，夏曉鵬（2000）認為這是種「邊緣者的結合」，家族內部的不平等反應國際分工。閩南人的婚姻也照文化腳本進行，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是跨階級的家庭進行特定交換，貧窮家庭靠女嬰的出賣換得經濟報酬，讓有錢的家族能夠繁衍子嗣。「解嚴世代」是相當異質的群體，自小經驗不同的族群和性別關係。

（二）產業轉型和家庭生命歷程的連動

十萬大軍撤離金門，阿兵哥經濟消逝，引發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王篤強，2014）。軍隊留下的土地有上萬顆地雷、未爆彈也亟待處理。靠軍營發展山外、小徑、烈嶼鄉的東林從此沒落，原以軍隊維生的商店幾乎一半歇業（羅志平，2010：45），只有金城再度成為最熱鬧的地區。家庭做為回應變遷的制度如何因應這些突變？參與者中只有 X02 的爸爸是水電工，工作穩定，其他家庭受到直接衝擊，出現兩個路徑，一是回到老路（農漁業兼臨工），一是另闢新局：

我們家前面是兵營，家前面做理髮廳、後面做小吃店、樓上就撞球間。到我幼稚園，我們開車去軍營裏面送貨，阿兵哥一直欠債一直記帳，阿兵哥全部退光後，錢要不回來了，我爸就沒有做了，把小吃店關掉了，爸爸後來做工。（受訪者 B01，2019/02/03，當面訪談）／阿兵哥很多！就進去軍營剪，原只要 10 塊錢，後變成 50 塊，利用晚上時間，爸爸下班，媽媽就去剪頭髮，現在沒有了，收起來了，現在剪老人家，收入不一定、不穩定。（受訪者 H01，2018/08/01，當面訪談）／媽媽是剪頭髮、爸爸開怪手，以前剪髮，生意很好，去部隊剪，一顆頭 50 塊，就嚕一排，從 4 點剪到 9 點，都是媽媽

在撐這個家，爸爸後來肝硬化，就沒做，就兼臨時工。(受訪者 S02，2018/09/02，當面訪談) / 爸爸做工程中間有發生事情，那時我很小，他有做過救生員，媽媽幫阿公阿嬤做小吃店。(受訪者 T02，2018/12/28，當面訪談) / 爸爸那個時候白天做鐵工，晚上開計程車，一直到我高職，爸爸就專門開計程車，鐵工受傷就沒有繼續做，媽媽原本沒工作，後來就做打掃。(受訪者 X03，2018/12/28，當面訪談) / 我們家之前開漫畫，也有兼小吃，媽媽跟爸爸顧店，……後來沒有阿兵哥，就顧田。(受訪者 S01，2018/08/01，當面訪談)

家在軍營附近的 B01、H01、S02，直接受到去軍事化的衝擊，軍人撤離後，家庭收入頓減，父親回到務農、兼臨時工，會剪髮的母親改幫社區長輩理髮，外籍配偶因先生工傷、失業，走出家庭做清潔工 (X03)，後戰地社會的變遷重組家庭與社會的勞動力，隨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家庭被邊緣化。

有幾個家庭經歷轉型，在新經濟體系中找到定位：「開店」，環繞餐飲業和建築相關產業，回應縣府以觀光立縣的政策，運用金門地利之便，做國際貿易，在新經濟體系成為「小」資本家：

阿公在小金開餐食店，賣小吃。那時候阿兵哥多，就賣小吃、還開理髮店，爸爸也有在那邊幫忙，跟我媽媽結婚、生我大姊後才過來金城，他有去送報紙跟瓦斯，後來去金酒兼差，最後去跟人家學技術，然後自己開店，媽媽就一起。(受訪者 A02，2018/10/17，當面訪談) / 爸爸有先做過裝潢，又換計程車、換吊車，因為計程車生意不好，那時候沒有人做吊車業，工程也多，爸爸開始做吊車。(受訪者 H01，2018/08/01，當面訪談) / 我媽開店，店面是用租的，我們家先開服飾店，……軍人越來越少了，生意越來越不好，就轉到餐飲店，到小學時才開。(受訪者 A01，2018/08/20，當面訪談)

在行政院頒定「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與金門縣整體發展規劃下，金門被定位為「國際級永續觀光休閒島嶼」（金門縣政府，2009），縣府扶植觀光與旅遊業，引進臺灣輔導資源，打造金門特色商品，促進產業轉型（葉素惠等，2010），微視層次是多數家庭須自尋生路。開店，在金門並不特別，從戰地政務時期以駐軍發展出的民生業，不需特別技術和龐大資本，開店、歇業相當簡易（羅志平，2010：42）。解嚴後新開的店，需具備特定技術和設備，原物料經臺灣或廈門，店家成為最小的生產單位，被納入自由競爭體系。能開闢新局的家庭，多是金門人結合。A02 父母搬到金城後，做過不同的臨時工，還兼夜間工作，後來學技術開店，累積名聲。H01 父親曾做裝潢和開計程車，看到吊車市場的商機，學開吊車，成立吊車廠。T01 父母研發餐食，專賣早餐。只有一家來自臺灣，A01 父親原本是記者，到金門開店，經過數次轉型，轉為餐飲業，父親遊走國際貿易。新經濟體系創造男性創業機會，家庭被納入生產系統，已婚女性置於次要角色，與戰地政務時期的性別分工有顯著不同。

解嚴後金門生活方式的改變，包括營生和組織家庭的方式，不在計畫內（宋怡民，2016：286）。本研究發現經濟體制的突變是篩選機制，劃分家庭，以金門為結合的家庭可另闢新局，多以自營作業者，家庭被納入新的經濟體制。另一群家庭走回老路，多是跨族、跨國家庭，在自由經濟下被邊緣化。此外，浮現金門家族連結市場發展的軌跡，主要是閩南宗族一直有因應外在變化的彈性與反應力，得依各種局勢順勢發展（陳支平，2004：263），因此，兩岸三地的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為閩南家族提供新的舞台。

（三）童年生活的差異

金門家庭的分化形塑兩種幼年生活，一群在父母開店和工作穩定下，從小補習才藝、補習教育（4 位，A01、A02、T01、X02）；一群

的父母務農、打臨時工維生，她們多在家幫忙家務，生產方式形塑出兩種童年生活：

幼稚園的時候，我有學珠心算，那時候考到段位……，心算很厲害，我媽以為她生了一個天才兒童，後來考試失敗，心算就不碰了。幼稚園的時候，媽媽說我一直都有在教小朋友念ㄅ ㄆ ㄇ ㄏ，或教他們算數學，當小老師，幼稚園當模範生。之後我為了要跟我堂姊在同一個層級的英文班，我就一直拼命地讀英文，英文就起來了。(受訪者 A01，2018/08/20，當面訪談) / 小時候媽媽一直在培養我跟哥哥彈鋼琴，我哥鋼琴彈得比我還要好，……還有小提琴，我媽願意花錢在我們身上，是一直被瞧不起吧，希望我們去做一些自己有興趣的事，讓自己比較不一樣，就是讓一些金門人比較看得起啊，就培養我們。(受訪者 A01，2018/08/20，當面訪談)

我們參加國樂社，就是國小到國中，妹妹比較久，她到高中。我到國中就沒有在學，因為那時候要學測，壓力很大。我們就是參加社團，一下課就是練習、練習，練習完再寫功課回家。就是我們多了一項他們沒有辦法去做到的事情。(受訪者 A02，2018/10/17，當面訪談) / 我4歲就開始學鋼琴跟舞蹈，父母從小培養我，學大提琴、學鋼琴、學跳舞，就是以後的發展方向會更廣，就是妳的選擇方向可能會多一點，應該是這樣吧。(受訪者 T01，2018/11/23，當面訪談) / 我學的我妹都學，我有學書法、珠心算、舞蹈，舞蹈最久。我妹後來有繼續，我到國中就沒有學了，珠心算我也有學，書法是我們一起去的，我還有學畫畫，我兩個堂姐，看她們跳舞，就說我也要學，之後就是書法，再久一點好像就畫畫。(受訪者 X02，2018/12/28，當面訪談)

金城幼稚園是金門第一所公幼，3歲可入校，重視才藝培育，讓這幾家女孩從幼年進入學校，接受訓練。父母願意投資女兒學才藝和

教育，翻轉閩南文化素以投資男性讀書的傳統，凸顯在發展價值宰制下，教育成為人力資本的主要途徑，補習才藝增加機會與優勢，金門父母必須超前部署。女孩所學的才藝相當多元，音樂、舞蹈、語言、書法及心算等等，需要家庭具備一定的經濟能力。此種風潮的形成，可能與金門青年得透過離島保送到臺灣念書，在保送額度有限、師保具備相當要求的制度有關，¹¹在此競爭架構下不僅改變家庭的責任，也重塑家庭與學校的關係，回應制度的需要（國立金門技術學院研究小組，2004）。

其他家庭的女孩們，因為家境，沒機會受才藝教育，更在暴力、手足身體疾病的環境下（X03 的妹妹幼年生病影響聽力、T02 的妹妹因醫療疏失需長期坐輪椅），從小承擔照顧責任，活動範圍限於鄰里。Lareau (2000) 發現社會階級對童年生活影響甚大，中產階級家庭的幼童較有資源參與學校各種正式活動，低階家庭的子女只能在社區玩耍，學業表現出現差異。本研究發現女童生活的差異鑲嵌在遷移和流動的時代，跨國婚姻和跨族婚姻引發流動的生命歷程，造成特定時空下「邊緣者的結合」，形塑女童以家庭為主的勞動生活，閩南家族本地的結合，同族優勢加上市場經濟給予的機會，形成以學校為主的學習生活，呼應生命歷程理論關注早年生命經驗的劣勢／優勢，可能影響未來發展（Michael et al., 2016: 8）。

一、鉅視層次：新的地緣政治引發人才競逐，加速離散

解嚴前金門已設立公立幼稚園、一所高中（金城鎮）、一所高職（金湖鎮）。為培養在地人才，解嚴後高雄科技技術學院在金寧鄉設分

¹¹ 即公費師資培育體系，在戰地政務時期為了穩定戰地師資，開始有國中生保送師專。解嚴後，金門縣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透過師保制度升學管道，只要符合設籍、就學資格，在校成績達到一定指標，憑學測成績競爭（音樂、美術及體育科系可能加考術科）（洪佳好，2022）。

部，2010 年後改制為大學，隨著與中國交流日深，空中大學、銘傳大學和清華大學紛紛在金門設立分校，在金門的教育體制從此完備，跟著臺灣的制度脈絡，發展以年齡為基礎單一時間序列制度，家庭、教育、工作有先後次序。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教育、工作的先後次序是來自工業社會的生產方式及福利國家建構人生階段的企圖有關 (Mayer, 2004)，其形塑常態化生命架構，未必適用於金門，加上中國崛起，「前進中國 / 大陸」蔚為浪潮，臺灣人到中國工作、念書人數有增無減，金門處於兩岸三地交界，受中國各種優惠，有更不同的選擇結構。

(一) 中國小留學生：經濟趨力

大部分孩童照國家義務教育規定，7 歲時入小學，受 9 年國民義務教育，金門子弟多在熟悉的環境，與相同年紀的表、堂姊妹和同齡鄰居一起讀小學、上同所國中。只有 T01，因「補習」表演藝術，透過人際網絡，踏上到對岸念小學的路：

會到對岸是媽媽告訴我那裡不錯，我就覺得好，爸爸其實不太支持，因為他很疼我，媽媽就一直跟我說，妳就去那邊試看看，如果不行，一年回來，我們還可以上國中，我說好。……之後的事情就是以淚洗面，因為電話亭，那時候沒有手機，也不能用手機，就是週一到周五，如果你有通訊設備都一定要交上去，周末拿回來，學校裡有三個電話亭，每個電話亭都要排隊……很軍事化的學校，我就是一天要打三次電話，早上中午晚上，一下課就衝到電話亭，打電話都不說話就是哭，每天就是哭，媽媽也是一直哭，一開始我每週都回金門。
(受訪者 T01，2018/11/23，當面訪談)

她到對岸念小學背後存在的家庭歷程，是母親強力支持且父親配合，讓她隻身前往，日日以淚洗面且週週返金。多年以後，大十歲的

哥哥透過同學，在中國發展，可見她的遷移帶動家庭變遷與發展。

金門有特定的優勢與機會，T01 從小到對岸念書只是一個縮影，即使冒著學歷不被承認的風險（吳依凡、藍佩嘉，2011），仍要走進中國。中國崛起，重塑新的地緣政治，金門身處兩岸三地的交界，積極建構金門的優勢，如 2004 年舉辦第一屆「世界金門日」，動員全球的金僑造勢，讓全球看見金門的重要性（劉香蘭，2021）。此外，金門人在解嚴後到廈門置產，在「金廈一日生活圈」經濟發展架構下，兩門往來相當密切，金門人與入籍金門的臺灣人在廈門的消費一年可達 30~40 億新臺幣（羅志平，2010：250），可見金門脫下「戰袍」，金門家族透過人口與資本的流動，與對岸關係展開更深的關係，金門人自有一套劃界政治，以達到發展的目的。

（二）到臺灣念大學的連結機制：離島保送

7 位女孩經過聯考，2 位進入金門高中（A01、A02），其他進入高職，在文憑主義下，高中、職是一個分化系統，區分「會念書」和「愛玩」的次群體。解嚴後國家頒定「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曾大千等，2014），¹² 讓偏鄉離島青年得透過保送機制進大學，名義上是促進教育機會的平等，實際上是讓離島青年繼續往臺灣流動。

離島保送作業是臺灣各大學系所提供名額，再由金門學校老師安排，讓她們在有限名額下彼此競爭：

我的分數應該上○○大學比較不知名的大學，因為我們有離島保送，就是我們跟自己學校的人競爭，某些學校會開放幾個名額給金門學生，我們自己去競爭，我那時候有填○○英

¹² 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及琉球地區之教育文化應予保障，對該地區人才之培養，應由教育部會同相關主管機關訂定保送辦法，以扶助並促其發展。

文系，也是我們自己幾個學生競爭，我們自己去排序，看誰可以到好的學校，這樣的制度不錯，像我成績不好的人還能上好學校。(受訪者 A01，2018/08/20，當面訪談)

我們老師那時有安排好誰上哪、誰上哪，就真的是誰上哪，其實大家都照老師安排的填，最後就排到○○。那時候有同學跟我差2分，老師有找她來聊……她家人好像沒有想要她去臺灣，就安排我，本來就要去跟人家搶啊，就競爭激烈。(受訪者 X02，2018/12/28，當面訪談) / 那時候比較喜歡幼兒，在讀高職高二時，老師就會先問說你想去讀哪個學校，他們就會去幫我們要名額，名額要到的話，考完統測後他就會要你填志願，當時我是填○○啦！因為○○沒人填，我就去填，先把○○填下來，保證穩上。(受訪者 H01，2018/08/01，當面訪談) / 高職畢業出去讀大學應該都是離島，因為離島名額很多，對大家來說能上國立大學就好，都會盡量填，我們當初填國立大學，如果都填同樣的，名額不可能給我們那麼多，所以要分散。(受訪者 X03，2018/12/28，當面訪談)

具有協商、競爭、分配的過程，以國立大學優先安排，再考慮科系，她們進入臺灣不同大學。X02、H01、S02 進入公立大學助人專業相關科系(如社工系、幼教系、諮商輔導系)，A01 與 A02 進入私立大學的餐旅系與設計系，她們唸的科系反映後工業社會需要的職類，也是臺灣正發展的產業。

她們到臺灣念書的動力，如 A02 說：「你會覺得要離家，面對更新、更不一樣的東西，才有發展機會。因為在金門久了，你會覺得你一輩子都會待在金門。你在金門唸書、在金門工作，很難有去外面發展的機會，但是如果你去臺灣念書或許你有辦法去國外、大陸，你有辦法找到更多工作機會，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們傳承臺灣代表發展、金門象徵落後的二元思考，讓她們迫不及待的想要離開金門，現代化趨力讓個體想要做出改變，透過連結制度，讓「解嚴世代」不

受家庭影響，以單打獨鬥的方式離家，與上一代成群結隊到臺灣做女工，緩解家計的目的有所不同（劉香蘭，2020）。教育做為離島青年向外流動的主要機制，因應臺灣後知識經濟社會發展所需，在這過程中她們經驗去脈絡化，身處後工業社會裡，現代化思考與生活方式改變她們的價值觀與人生態度。

（三）從教育「出軌」：個人化生命歷程？

國家雖建立家庭－教育－工作單一次序領域的人生架構，2位女孩未婚懷孕，教育畫下休止符，出現個人化生命經驗：

我高職上半年我就去臺灣了，到臺灣好像一年多吧。在阿姨那邊幫忙，就不唸了。……回來也沒有復學，因為不喜歡念書。那時候回來是在撞球間，在撞球間認識前夫。認識他的時候我未成年，我小孩出生時剛好18歲，那時我爸爸是叫我不要結婚，就去臺灣生活，如果那時候我有聽爸爸的，我可能現在就不是這樣。（受訪者 T02，2018/12/28，當面訪談）

我19歲生小孩，結婚也是19歲，我是先懷孕的，但是從我姊、還有我開始後，就大家都這樣，所以我就覺得還好，前面有幾個年紀都很小啊，我19歲算ok，當初也是想要拿，但當時剛好我姊姊的女兒流掉，她就跟我媽講說，不然就結，就直接生。（受訪者 S01，2018/08/01，當面訪談）

她們的生命歷程堆疊移動、家暴、離家、非典型工作、懷孕等事件，如骨牌效應讓她「脫離」常態化生命歷程架構。住在自然村落的S01因非預期懷孕，倉促成婚。訪談得知她的姊姊、同村青少年，也有未婚懷孕的情況，她不認為非預期懷孕是嚴重的問題。貧窮與特定族群青少年懷孕的關聯已被討論（Aparicio et al., 2014），未婚懷孕是少數族裔的青少年，身處變遷的政經環境，透過獲得母親身分避開教育的壓迫，進入成年期的方式（Winters & Winters, 2012）。從官方金門日

報以「問題」的角度討論未婚懷孕事件（翁碧蓮，2002a），本文卻認為在閩南宗族體系內，婚姻是女性取得正式身分的入場券，生出男性子嗣是奠定女性地位的標準，教育和學歷並非衡量女性價值的標準，因此，意外懷孕呈現新舊社會存在競合的價值系統，參與研究的女孩遵循閩南家族的遊戲規則。

20 歲前「解嚴世代」女性生命歷程差異加大，家庭分化的形塑教育領域參與的長短和型態，流動與離散是她們生活的寫照，存在兩岸三地人才競爭的架構，她們以個體的方式遷移，接受現代化的洗禮。小媽媽的出現反映新舊社會的交替下，閩南文化與現代制度的價值之競合。

二、產業層次：跨界流動下的多元市場及女性依附工作

到臺灣念大學的幾位女性，畢業後回金門進入服務相關產業，是兩島長期失衡發展下，臺灣市場給她們壓力，金門市場存在特定機會的結果。臺灣較早進入後工業社會，高度競爭與高消費市場產生推力，金門新興產業提供女性就業機會，她們選擇回金門工作。此外閩南家族的孝道中，帶有情緒勒索的現象，讓她們選擇回家。如 S02 母親對她說「妳不回來就是不孝，妳不回來就是不愛我」。比較不同的是，A02 在大學畢業後留在臺灣接受兩年寵物美容師訓練，取得證照相當疲累，回金門休養時，在父母鼓勵下在金門開寵物店，家——讓她們重新依附島嶼。

她們的工作屬於「女性的工作」，都在服務業，包括公部門、民間單位的助人工作，旅遊業 1 位、一般特產商店。全職受雇共有 5 位，1 位自營店面，2 位已婚的參與者在門市、早餐店做兼職工作，她們工作場域反映兩岸三地不同市場的競爭和壓力。

(一) 離島加給促進競爭、短期聘僱增加流動¹³

4 位女性進入助人工作領域 (S02、H01、X02、X03)，如社工、幼教、幼保和毒藥癮個案管理，在證照化與簽約化浪潮，門檻須是大學相關科系或有專業證照，且是一年一聘的短期僱用，加上「離島加給」措施吸引臺灣人到金門工作，助人產業內是族群競爭、高壓、不安全的結構：

畢業後就回金門找工作，找工作的時候第一個你沒經驗，第二個因為你沒有教育學分，你是落後的，你去面試是先被刷下來的，因為他們第一招都是先要有教師證，第二就是要有教育學程，第三才是大學畢業，第一招如果有人，後面就不會再招了。(受訪者 H01，2018/08/01，當面訪談) / 金門公幼蠻多、私幼少，臺灣人也會來應徵，被刷下的機率很高。(受訪者 H01，2018/08/01，當面訪談)

兩歲以下要考保母，我是有去考，在○○那邊工作基本上要有保母證照，保母證照是你自己去考，學校只是選修課，在學校時我就想說那我去考好了，我就有去考，我現在是簽約的，以後會想說要不要去考公幼，畢竟薪水還是差很多。(受訪者 X03，2018/12/28，當面訪談)

證照成為宰制的價值下，讓高教專業教育－證照－市場扣連，建構教育與產業銜接的制度關係。在專業分工與區隔下，擁有雙證照、多證照增加跨領域的就業優勢，如 X03 讀幼教系時，就考取保母證照，適逢政府實施幼托整合政策，她有雙證照的優勢，不會被淘汰。

¹³ 「彈性安全」(Flexicurity) 指勞動市場彈性化與社會安全保障間相互與平衡發展，彈性包括外部數量－僱用、工時、功能與薪資之彈性；安全包括工作、就業、所得與連結之安全，彈性安全政策法令面強調就業保護規範之強度和政策面強調所得與就業安全之程度 (李健鴻，2007)。

「離島加給」源自於「各機關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因離島交通不便，生活條件低於臺灣，尤其金門、馬祖早年有砲火肆虐之險，為吸引公教人員到離島工作，才給臺灣本島公教人員赴離島就任的額外津貼（朱鎮明，2012）。如今，金門有全國最優渥的福利，吸引福利移民（劉香蘭，2018），「離島加給」讓臺灣人湧進金門就業市場，增加競爭。

因為金門公立幼兒照顧體系內多是臺灣人，讓剛畢業回金工作的金門子弟只能先「蹲」私立幼兒園工作，伺機而動：

臺灣人來金門的想法是，我先有一個正式身分，之後就可以再回去，因為離島比較好考，金門有很多幼兒園裡面的教保員，六成以上都是臺灣來的，一來一簽約至少兩年以上。（受訪者 H01，2018/08/01，當面訪談）

現在金門幼托整合，因為兩歲是保育，然後三歲以上是教育，它就把它混合在一起，兩個混在一起很累，……現在是準公共化了，報名的人就越來越多，……家長找不到可以幫他們顧小朋友，就選擇私立的，我們私立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很可能三歲之後就走了，因私立花費高，……這樣變化我們就很累，我是簽約的，以後會想說要不要去考公幼，畢竟薪水還是差很多。（受訪者 X03，2018/12/28，當面訪談）

金門的幼兒照顧體制與臺灣不同，臺灣幼兒照顧體系以私立幼稚園和托兒所為主，但金門幼教以公立為主，縣府又提供母親（家長）照顧津貼，讓多數家庭選擇進公立為第一順位。公立幼兒園因工作穩定、金門福利好，多被臺灣人卡位，讓 H01 處於劣勢，要等到臺灣人在金門「short stay」結束，才有跳槽的機會，她只能暫時待在私立托兒所工作，在短期契約、工作量大、工時長和薪資較低，讓她深感不平。也因離島加給造成幼兒照顧產業的人力流動與不穩，實有可能影響專業體制的發展。

擔任社會工作人員有 2 位，1 位在縣政府社會處，1 位在民間協會，

也是一年一聘，兩處的業務雖然不同，卻也是一樣地高壓且高工時：

從工作成就感不多，……找議員來關說，政治人物會涉入，那個感覺很不好，回家就跟我媽媽哭說我真的很痛苦，我想回臺灣、我不喜歡這個環境，為什麼這裡大家都靠關係，年輕人就做到死，有背景的都很輕鬆，這是很不適應……後來我調科，那時加班加到九點，就一直做行政，民眾會一直打投訴電話，工作環境很高壓，我就受不了，就去接受諮商服務，對我的生涯很迷惘。(受訪者 S02，2018/09/02，當面訪談)

我們那個社工就是她一個人做 35 個案，社會處覺得外包這個，你（機構）就是要做，就算只有一個人，你也是要做完，所以她做得很累，我真的想很多，我還要繼續做？我才在想要不要去上訓練的課。(受訪者 X02，2018/12/28，當面訪談)
/ 每次外督都說她做不好，但是就真的只有她啊，要做這麼多，生活重建都要做，我沒有接觸過，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不太了解，我還請教大學老師，還買了一本什麼表格，但我就是看不懂。(受訪者 X02，2018/12/28，當面訪談)

S02 和 X02 在工作上體會到高壓、高工時、高工作量和高挫折，與縣府內部的區隔和民間單位受政府控制有關。縣府內是跨代組成，以身分區分正式公務員和約聘僱系統，在金門福利以補助為大宗，鄉親透過關說對基層官僚的施壓，讓年輕、剛畢業的約聘僱人員當擋箭牌。X02 在協會做事，接政府委託案，工作量和內容受政府箝制，因流動率大、人力不足，讓她備感壓力。

金門助人工作雖然多元，均存在公、私部門的區隔，夾雜族群、年齡與性別的多重關係，第一線直接服務人員多由年輕女性擔任，就其勞動型態、契約規範和薪資保障來看，她們是次級勞動者。¹⁴

¹⁴ 勞動市場的結構中核心勞工處於主要勞動市場，是由全時、具永久地位、對組織

(二) 自營店（寵物店、餐飲店）下的生活失衡

A02 留在臺灣學習寵物美容，取得 B 級證照回金門，經父母支持與鼓勵，開寵物相關的店面，展開自營作業模式：

寵物都是養在家裡，不會帶出門多，尤其是貓咪不太可能會帶出門，金門養寵物的人真的蠻多的，我也是開了店後才發現原來金門有這麼多人養狗。應該是因為金門生活的步調跟臺灣不一樣，臺灣生活步調快、花費比較高。金門的福利不錯、生活步調相對也比較慢，就比較有辦法在家裡養一隻狗，金門有一些主人，對於狗狗的花費也是很多的，出乎我們意料，竟然這麼捨得。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不想生小孩，就會覺得沒有伴，沒有依靠，就會靠養狗得到慰藉，養了久了之後，把牠像顧小孩一樣，我們真的看過很多主人把他當作小孩一樣照顧……很多養狗的，幾乎是單身的或是沒有小孩的，通常看到狗狗很可憐、很糟糕，就是那種結婚、生小孩，沒有時間照顧狗，反映出他們的背景。（受訪者 A02，2018/10/17，當面訪談）

A02 開店後接觸到單身、無子女的金門居民，養毛小孩作伴。在動保法下，寵物美容、販賣和比賽列入國家管制，寵物美容師須具備相關證照，並分不同級別，從 C 級拿到 A 級起碼需要 2 至 3 年的訓練，是不小的投資。開店，讓她被綁在店裏，更因長假和過年，飼主要回臺灣，讓她難有休假，失去工作和個人生活的平衡：

長遠發展有重要地位者；邊陲勞工有兩群，一群是由全時員工，技術替代性、隨時取得性高，流動性高，如文書或低技術性之體力勞工，另一群是由去標準化工時者組成，包括兼職、定型契約者與派遣工等，此群體的工作保障最少（李碧涵，2005）。

她們要回臺灣或要出去玩、放寒假、放暑假，就是有過年過節、連續假期，金門會比較多，所以過年我們寵物住宿是要提前預訂，因位子不多，樓上現在位子只有十個（受訪者 A02，2018/10/17，當面訪談）/ 早上我餵飯、晚上請助理餵飯，餵完飯就是休息時間，妳還是會有責任在，妳會想來看看它們有沒有怎麼樣，尤其遇到有生病的狗狗，我們就是要特別照顧，就是要早中晚都要來。因為生病這種狀況有時候是突發的，我們沒有辦法去避免或預防，因為如果它一帶來就生病，當然不可能給住，我們就是要盡心盡力照顧，因他主人已經出門了，也不可能退還。（受訪者 A02，2018/10/17，當面訪談）

全國寵物照顧服務產業在 2018 年銷售額達 18.1 億元，近 10 年成長近五倍（楊子江，2019），2021 年貓犬達 295 萬隻，首次超過 0~15 歲兒少數（徐如奕，2022），寵物用品及飼料零售業在 2018 至 2021 年成長 32.3% 及 29.4%，養毛小孩漸漸代替生育（未來流通研究所，2022）。金門家貓、家犬高達 6,000 多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相關寵物店有近 20 家，包括水族類、寵物美容工作室、寵物飼料店和相關寵物診所，窺見個體化下情感依附對象已有相當變化。

A01 家有數家餐飲店，每年寒暑假她都回店裡幫忙，讓兄長兼顧另一家店，各店客源不是觀光客，而是在地金門熟客，熟客靠觀光所得來店消費，形成生產鏈。四年來她在兩島間流動，夾在教育、家庭和工作間。另外兩位分別在旅行社和特產店工作，瞄準陸客，在旅行社工作需要發展客製化服務，因應旅市場競爭。

「解嚴世代」在不同產業接觸的國籍與族群相當不同，面對中國、臺灣和金門不同的群體，透過人、貨物與商品、語言和錢幣體系的交換和互動，她們勞動場域不斷地被分化，有競爭、被排除和壓迫，反映金門處於超國家地帶，存在模糊的國界、複雜的族群關係、時間相當貧窮、家庭領域被壓縮的勞動處境。

(三) 教育決定工作，階級分化的持續與加強

從 10 位女性的就業型態，窺見前一階段（教育）的影響力。未成年懷孕的兩位女性，先孕後婚讓教育中止，只能當一般店員，或因就業機會有限，只能兼職。有大學學歷的女性進入服務產業，全職工作或開店，加大同代女性的階級分化。近年，金門常住人口中，有近 1/3 至 1/4 居民從事服務業，女性約 8,000 多人、男性 7,000 多人，平均周工時在 42 小時（金門縣政府主計處，2017），可見工作宰制性。而男女就業率呈現男降、女增的態勢，重塑兩性生命歷程樣態。同代女性浮現階級差異，不同階級的女性有不同家庭—工作衝突的樣態，必須工作的藍領階級，幼兒照顧轉包給娘家，白領階級、自營工作者犧牲私人生活，這是國家以市場為主要發展途徑，產生的不平等，是冷戰結束後社會的隱憂（Jaquette, 2003）。

四、微視層次：婚姻靠邊站做為一種的抵抗

戰地政務時期，女性被軍事動員、從事生產，雖顛覆閩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¹⁵ 但並非父權制度的終結，而是一種重置（宋怡民，2016：237），女性被父權和軍事雙重宰制，父權因軍權更牢不可破（周妙真，2009：191）。解嚴後，市場經濟宰制，閩南宗族體制與市場的關係本質與樣態為何？「解嚴世代」處於甚麼特定機會與壓力？

¹⁵ 陳支平（2004：215-218）《五百年來福建的家族與社會》一書描述福建家族的系統和運作，依性別有不同生命歷程架構，男性被培育讀書、經營事業和擔任公職，女性嚴守道德規範，相當重男輕女。女子在公開場合沒有發言權，強調三從四德、不要干預家族事務，甚至限制婦女參與對外活動等。

(一) 留人的性別邏輯：領域參與的文化制約

不同歷史時期，金門人遷移原因、管道和樣態有所不同，戰地政務時期以前主要是男性循著網絡離家到南洋，戰地政務時期在流動管制下以年輕男女到臺灣為主，限定在教育與工作，解嚴後人口流動去管制化，教育成為金門青年離金的主要機會，能否離家，存在性別邏輯：

我大學在金門念，家人就說臺灣花錢太快了，爸爸媽媽賺錢來不及妳花，妳也沒有辦法自己去外面，一個女生太辛苦，妳就留在家裡顧家，順便讀大學。我念日間部○○○家裡對我的期待就是不要離開、不要往外跑就好了、不要花太多錢，畢竟妳是女的，妳學太多幹嘛，反正嫁出去都是別人的，當初的觀念就是這樣，女生妳就在家裡，男生才能往外跑，第一個擔心妳安全、第二個擔心妳花錢。(受訪者 B01，2019/02/03，當面訪談)

金門家庭對女兒有「三不」政策：不要離開、不要往外跑、不要花錢，尤其閩南文化中，女兒被稱為「外姓人」(陳支平，2004：151)，早晚要嫁人，以保護之名，留住女兒做活。但隨女性受教育和工作後的經濟自主，開始出現反動，如 B01 大學畢業後，工作一年，先斬後奏出國打工換宿，就是一個例子。

更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留一男子在島上的習慣，經歷時代變遷，卻讓年輕男性難以離家，形成「男大留成仇」的現象：

當初是我媽想要我哥留在身邊，現在比較不會去講他，我覺得哥顧慮到家裡面，就是我媽會孤單，所以留下來(妳哥什麼時候他想要離開?)大學啊，他想要去臺灣念，我媽不准，媽說長子要留在家，我要慶幸我是女生，我沒有那個包袱、沒有那個壓力，我哥比較逆來順受，他應該多少心裡對媽媽

會有一點埋怨，覺得說當初妳爲什麼不讓我出去讀書，……他現在已經沒辦法了，家裡面有很多店，我哥現在是在幫忙顧店，如果他走的話，店也會沒有人。(受訪者 A01，2018/08/20，當面訪談)

就是金門傳統家庭的那種型態，就是太保護男生，金門傳統家庭不太會去要求男生一定要怎麼樣，現在已經不是說什麼都要男生去撐。(受訪者 A02，2018/10/17，當面訪談) / 我男朋友就是在本地念大學，他畢業後，因爲他們家是開計程車的，他沒有去做他念那個科系的行業，他就是幫他們家開計程車，他在念書期間，他有去○行兼差打工，然後你看○行、計程車，他現在就是當教練，沒有什麼機會，沒什麼條件可以去外面。(受訪者 A02，2018/10/17，當面訪談)

金門家庭留一男子的傳統，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意涵。僑鄉金門時期，生有數個男性子嗣的家庭，會留一個男孩協助母親處理家族事務（江柏煒，2013）。此傳統在解嚴後讓金門出現「留守男孩」，甚至被輕視，反映臺漂做爲「進步」的標記，按此分化群體。「留守男孩」可能與繼承傳統有關，長男要繼承家業，被期待留在金門，有家業繼承，無後顧之憂，不須「積極努力」。相形之下，被繼承體制排除的女性，須努力自立，讓女孩得以離家，窺見發展的價值，在閩南文化交錯下，兩性有不同離散、教育、工作經驗，兩性價值觀和世界觀因此有所不同，可能是性別關係緊張與衝突的根源。

(二)「以母爲尊、以子爲貴」的父權

未婚懷孕的兩位女性在一年內獲得妻子、媳婦和母親的多重身分，相依的生命網絡隨之變化。婚後，她們經驗到閩南家族「母以子貴、以母爲尊」的關係（劉香蘭，2020），媳婦地位相當邊緣：

我先生也是那個地方的，對方是單親家庭，剛嫁過去比較苦，第一年還債，蠻辛苦的，現在兩個人上班，比較有存款……剛結婚沒工作，老公一個人賺，那時候生一個四個多月，我就去外面上班，小孩就給媽媽顧，因為我婆婆也在上班，我才 19 啊，就每天吵啊，到生老二後才慢慢去改變自己。(受訪者 S01，2018/08/01，當面訪談)

我早上在餐飲店工作、兼做保險、還要照顧三個孩子，事情真的很多，……我先生不是以我們為主，但我是以我的孩子為主，我重心在我孩子身上，不是在先生身上。如果他今天發生什麼事，苦的是我的孩子，我會為孩子著想忍耐，先生為她媽媽想，他們感情比較好，但是跟我們感情就沒那麼好。(受訪者 S01，2018/08/01，當面訪談)

「母以子貴、以母為尊」的家庭關係，有歷史典故。僑鄉金門時期，男性下南洋打拼，島上女性承擔所有家務，母子相依為命，形成牢不可破的強連結。戰地政務時期，已婚婦女從事阿兵哥經濟，支撐家庭經濟，子女看在眼裡，唯母是尊(劉香蘭，2020)。一直維持農漁業為主的地方，宗族仍為主要的社會結構，加上 S01 的先生是單親家庭，媳婦角色就更邊陲。S01 藉由工作、考證照累積人力資本，重心轉向工作。T02 婚後體會到女性只是生育工具，經過戲劇的過程，勇於離婚：

我結婚後就搬住在婆家。之後他偷吃被我抓到，他之後不回家。他以前會回家，之後不回家，一直打電話給他，叫他回家，他到後面就是不接電話。後來覺得他家是因為我懷孕，可能是男的，才主動求婚，後來生出來是女的，他又跟酒家女在一起，我生氣搬出來，婆婆站在他那邊，婆婆跟我討論贍養費，談完後我就搬出，小孩出生滿月後我就離婚，女兒我沒有辦法帶，都是我媽幫忙。(受訪者 T02，2018/12/28，當面訪談)

非預期懷孕讓 T02 有機會進入富貴之家，因未生男性子嗣，失去利用價值，走向失婚。過程相當戲劇化，先是先生到酒店尋歡，外遇對象懷孕，夫家展開攻勢，婆婆出面和她談判離婚，讓她覺悟到她的婚姻是建立在生育的基礎，勇於離婚。爲了生存，在禮品店工作，女兒托母親照顧，現選擇與男友同居，選擇「不婚」，少了婚姻束縛，但處於工作和照顧的衝突。

(三) 寧願單身的壓力結構：社會、文化和經濟的交織

8 位未婚女性存在「恐婚」是社會、文化和經濟交織的過程。首先，結婚是社會參與的改變、自主性的失落。B01 覺得「維持單身，就是維持自由」，S02 表達「趁著還自由的時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男友也還管不住我，想幹嘛就幹嘛」，在閩南家庭的傳統下，婚姻是女性身分轉換、領域參與的分水嶺，也是自我和無我的界線：

結婚的話，就會牽涉到研究所的部分，我一直擔心我結婚之後，沒有時間跟機會再回去讀研究所，因為那個女性角色。人家可能會說，你媳婦又回去讀書，就會被議論，被說都有老公，老公都不顧喔，金門的人普遍會說都結婚生子了或都結婚，老公丟在金門，自己回去讀書，真自私。(受訪者 S02，2018/09/02，當面訪談)

婚姻是金門女性獲得社會身分的主要管道，透過婚姻關係進入到宗親網絡，以家庭爲主。而金門祭祀和祭祖是傳承宗族內部聯繫、對外維護族威的手段（陳支平，2004：229），海內外宗親和子弟均要回金，準備千萬不得馬虎（許美玉，2009：149），但多由媳婦負責，更是特殊的文化設計，讓媳婦連結歷代宗族、家族，隸屬家族之下，受到宰制。因次數頻繁、過程繁瑣、責任甚重，成爲媳婦的痛（陳麗玉，2015），更是年輕女性不婚的原因之一（Chiu, 2017: 138, 2023）。如婚

姻對象不是金門人，婚後可能離開金門，讓 X03 難以割捨，男方是單親家庭，擔心婚後婆媳關係，不婚就是最佳狀態 (X02)。

最後是經濟考量，在男女就業率翻轉下，男性身兼數個兼職工作，女性承受全職工作高工時的壓力，婚育成為懸而未決的議題：

我們感情還好，但是經濟這方面，我考量這樣下去，我不敢結婚、生小孩。我生了小孩，因為這間店，現在會技術的只有我，我們平常都這麼忙了，沒什麼時間教別人，我也很累，我已經上一整天班了，還要熬夜十點、十一點教人，對我來說很麻煩啦。如果我生小孩了，沒有人幫我，那收入一定會減少很多，如果要再讓客源回來一定是很難。(受訪者 A02，2018/10/17，當面訪談)

A02 開店後面臨營運的壓力，她選擇不婚主要有二個理由，一是男友錯過出去奮鬥的「年齡」，慣於安逸，等著繼承「家業」，讓她對婚後的經濟沒有安全感。二是她考慮生育、照顧影響店的營收，增加人力支出，讓婚、育就此脫鉤，呼應金門日報報導「結婚歸結婚、生育歸生育」現象 (翁碧蓮，2002c)。從 A02 的經驗得知金門兩性在工作與生活的樣態已有相當歧異，婚、育的必要性與先後關係已有動搖。

近 50 年來，金門男女初婚年齡各延後 8 歲、11 歲，浮現晚婚，尤其是女性 (劉香蘭，2019a)。未婚率也增加，1976 年底每百位婦女中有偶婦女比例為 60.62%，2010 年減少到 54.39%，其中以 20~29 歲有偶女性比例減少最顯著，20~24 歲有偶婦女比例下降 46.5% (金門縣政府，2011：50)，2021 年底女性與男性有偶比率分別為 51.91% 及 55.10%，女性低於男性 3.19%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2022)，幾乎有一半的女性選擇不婚，本文發現是文化、經濟、社會交織的結果。

戰地政務時期，軍事成為宰制體制，女性身處非正式經濟和父權網絡，閩南父權透過重置，女性雖被剝削，但仍遵循女大當婚、婚後

當孕的價值。冷戰結束後，市場獨大，女性受教育時間變長，隻身流動的經驗增強個體化，隨著工作經驗和經濟獨立，閩南父權讓她們留在金門，與家族一起生活。然而，在婚、育具有性別化意涵的事件，形成市場與父權的對沖，讓女性選邊站，向婚姻說不。這是制度衝突達到極致的結果，也是女性集體的抵抗，是新的性別衝突型態，發生在私領域和文化範疇，所爆發的「新金門危機」可能影響閩南家族傳宗接代的任務及宗族永續的發展。

伍、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生命歷程研究，深度訪談 10 位「解嚴世代」女性，運用代內分化和多層次分析，解析「新金門危機」的脈絡（圖 1）。首先從制度層次分析，兩個歷史時期轉換下制度突變，金門成為跨界之地，增加金門人口與家庭異質性，縣府拚觀光與發展服務業，分化金門家庭，形塑兩種幼年生活，以閩南族群為主的家庭／宗族透過新市場得以發展（以男性開店為特徵），窺見閩南家族和經濟市場特定的關係。

再者，以年齡為基礎單一領域的時間序列制度下，女童從家庭進入教育，並在不同年齡到不同地區或國家念書，離散成為「解嚴世代」女性的集體經驗，存在兩岸三地「搶人大戰」的脈絡。尤其一位在國小成為中國小留學生，反映在「兩岸一家親」和「金廈一日生活圈」的劃界政治下，讓金門有不同於其他縣市的選擇結構，也讓女孩遷移的軌徑就此不同。離散的女孩經驗去脈絡化並體驗到個體化的價值，連結文憑主義和證照化的競爭價值，與「留守男孩」生命經驗的差異加大，形塑特定的性別張力。未成年女性懷孕中斷教育，顯示國家建構以年齡為基礎的時間序列制度有群體和區域差異，或許是一種抵抗，反映在閩南家族的傳統下，女性是透過婚育取得社會認可的身分，她們透過婚育對抗教育體系的競爭與排除，是金門變遷下新舊價值衝突

的寫照，結果是持續加大「解嚴世代」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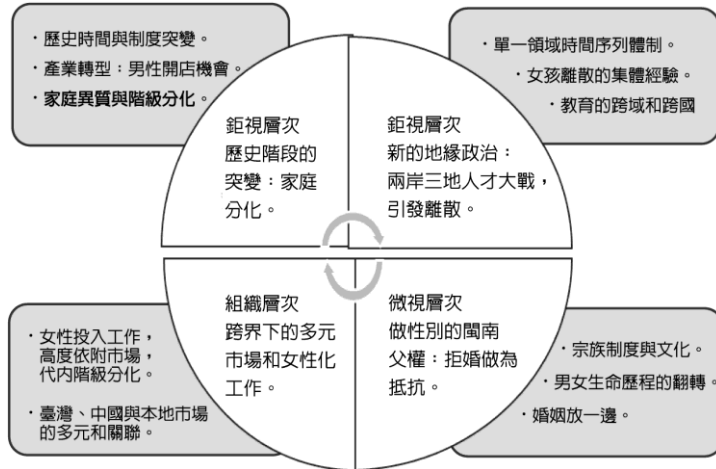


圖 1 「新金門危機」多層次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另從產業層次分析，後工業社會提供女性工作機會，父權使「解嚴世代」回到金門成為生力軍，依照學歷、證照重組女性勞動力。她們的勞動場域面對不同市場，接觸不同國籍、族群和身分的次群體，使金門成為交界，存在人、商品、物品、語言和金錢高度的流動和轉換，也是獨有的現象，但她們處於次級勞動者的劣勢，即使是自營工作者，在競爭環境下模糊私人與工作的界線。同代女性依據學歷和工作劃分不同階級，出現不同的家庭／私人生活與工作的衝突，是教育－產業／市場形塑特定的制度間關係區分群體，增強代內的異質。

最後是微視層次的分析，她們恐婚、不婚，是社會、文化和經濟交織的作用。閩南家族的傳統視女性為生育工具，透過祭拜讓媳婦受到宗族宰制，加上繼承以男性子嗣為主下，讓已婚和未婚女性須高度依附市場，形成「男性以家庭為重、女性以工作為重」的生命歷程，顛覆「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關係，女性選擇依附工作，是市場與

父權衝突極致化的結果，也是種集體抵抗，是此世代的主體能動性。

本文運用代內分化中多層次分析將「新金門危機」放在更大且更立體的框架，窺見前一歷史時期的壓力、兩個歷史時期的制度突變、國家與超國家政策形成的拉扯，形塑後戰地金門特殊的處境，產業結構與內部生態回應兩岸三地政治經濟的要求，是相當多元和分化的市場。「解嚴世代」高度依附工作，改變金門女性生命歷程樣態。「解嚴世代」生命歷程樣態有其特性，她們出生於社會動盪、家庭被重組的歷史轉換時期，成長於新的特定地緣政治，金門成爲一個非國家之地，閩南宗族佔有特定優勢，形成階層化的社會與家庭。教育制度與臺灣有特定連結、與中國存在特定斷裂，建構不同的機會與壓力，引發遷移。產業須回應兩岸三地的需要，服務業瞄準中國與臺灣、全球不同的市場，語言、貨幣、資訊和物品快速促轉化與流動。她們從小不斷因應如此特殊制度間關係，並隨年齡的增加代內差異，她們展現出與傳統金門女性不同的主體能動性，身處父權和市場對沖，集體對對婚姻說不，拒絕被多重制度的聯合宰制。

本文也發現在後戰地金門脫下戰袍，穿上資本主義的服裝時，閩南家族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市場的關係相當弔詭。父權讓她們回到金門工作，在婚育事件上卻形成對沖，她們選邊站爆發「新金門危機」。

「解嚴世代」的生命歷程樣態反映兩岸三地的勢力，以及父權與市場的特定關係，金門的不婚、晚婚與不生，不同於臺灣各縣市是在於後戰地社會有特定的變動、變動速度和影響，交雜文化和超國家的作用，相當複雜。本研究發現填補既有冷戰研究忽略後追後戰地的社會變遷、忽略女性經驗產生的學術空白，更窺見冷戰在東亞被期待看到文化的作用與力量。

需討論的是閩南家族體制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後戰地的社會，新舊體制青黃不接、價值混沌，金門門戶大開加速跨界和流動，新的經濟體系也需特定的結構支撐，既有的閩南家族需要新的制度做爲發展

平台，透過男性開店，顯示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家族發展存在一定的關係。但隨著「解嚴世代」的成長與發展，個體化和女性獨立意識抬頭，出現的「新金門危機」反映年輕女性面對父權的要求和市場的宰制對沖，不婚是一種抗議，但此可能影響以閩南宗族為本的金門社會原理，閩南家族要如何回應？當前縣府提供相關津貼無疑增強女性傳統角色的處方，對「誰」有效？採取與「外族」通婚？增加移入人口緩解人口發展的危機？這些動力如何削弱閩南家族的宰制，需要後續研究的精進。本文揭露男性繼承的父權體制是箝制年輕男、女發展的緊箍咒，需形成新的性別契約。因選樣限制，研究發現無法呈現所有「解嚴世代」的全貌，也期待有相關的研究產出。後續研究可針對解嚴世代女性、戒嚴世代女性生命歷程的對照，研析金門性別關係變化的軌跡，從男性經驗探索閩南文化對其生命歷程的影響，貢獻於生命歷程研究和冷戰研究。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篤強（2014）。〈烽火餘生下的金門：虛幻或真實的福利天堂〉，《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8(2)：163-203。
- 未來流通研究所（2022, 3月15日）。〈2021 臺灣消費與生活產業 top20〉。
<https://www.mirai.com.tw/2022-ranked-listing-of-taiwan-consumer-industry-with-percentage-change/>。
- 白永瑞（2016）。《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聯經出版公司。
- 朱鎮明（2012, 10月26日）。〈離島加給太超過〉。自由時報：<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625662>。
- 江柏煒（2013）。〈人口遷徙、性別結構及其社會文化變遷：從僑鄉到戰地的金門〉，《人口學刊》(46)：47-86。
- 江柏煒（2017）。《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縣國家管理局。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年度犬貓統計表〉。https://data.moa.gov.tw/open_search.aspx?id=ccezNvv4oYbO。
- 何欣潔、李易安（2022）。《斷裂的海：金門、馬祖，從國共前線到臺灣偶然的共同體》。聯經出版公司。
- 吳依凡、藍佩嘉（2011）。〈在「祖國」與「外國」之間：旅中臺生的認同與畫界〉，《臺灣社會學》(22)：1-57。
- 呂靜怡（2014）。《記憶與認同：金門婦女隊員出操的回顧》。秀威資訊出版社。
- 宋怡明（2016）。《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宋怡明、李仁淵（2009）。〈戰火下的記憶政治：金門，1949-2008〉，《考古人類學刊》(71)：47-69。
- 李世德（2017）。《金門危機：1950年代美國外島政策》。金門縣政府文化局。

- 李健鴻 (2007)。〈臺灣勞動市場的「彈性」與「安全」：國際比較分析〉，《國家與社會》(2)：215-259。
- 李碧涵 (2005)。〈勞動體制的發展：全球化下的挑戰與改革〉，《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6(1)：185-218。
- 李增汪 (1994，6月4日)。〈青少年藥物濫用案件逐年明顯增加 金門地檢署闡明吸毒犯法傷身〉。金門日報，版3。
- 沈惠芬 (2011)。〈華僑家庭留守婦女的婚姻狀況：以20世紀30-50年代福建泉州華僑婚姻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68-76。
- 周妙真 (2009)。〈戰地時期金門婦女與形象〉。金門縣文化局。
- 林津如 (2007)。〈父系家庭與女性差異認同：中產階級職業婦女家務分工經驗的跨世代比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8(12)：1-73。
- 林萬億 (2009，9月11-12日)。〈我國社會福利的回顧與前瞻〉，第三次民間社會福利會議研討會〔口頭發表〕。臺北，臺灣。
- 邱莉燕 (2018，10月2日)。〈廈門對臺灣人最友善？搬出60條優惠還有「超國民待遇」〉。遠見：<https://www.gvm.com.tw/article/46204>。
- 金門縣文化局 (2009)。《金門縣誌第三冊》。金門縣政府。
- 金門縣政府 (2009)。《金門縣綜合發展計畫暨第三期(100至103年)》。https://gad.kinmen.gov.tw/Content_List.aspx?n=150D74961BB27732。
- 金門縣政府 (2011)。〈金門縣政府100年統計年報〉。https://kmasd.kinmen.gov.tw/Content_List.aspx?n=3564CCE68287A975。
-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 (2017)。〈金門縣105年推動婦女福利：權益及保障統計專題分析〉。<https://ws.kinmen.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ExL3JlbGZpbGUvMTQzODkvNjc2MDY3Lzk3YTZlYTQ3LWZlMGQtNDlhZS1iMDA5LTAxMzY2ZmViN2QzOC5wZGY%3D&n=6YeR6ZaA57ijMTA15bm05o6o5YuV5amm5aWz56aP5Yip77yN5qyK55uK5Y%2BK5L%2Bd6Zqc57Wx6KiI5YiG5p6QLnBkZg%3D%3D>。
-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 (2022)。〈110年金門縣性別統計圖象〉。<https://cabkc.kinmen.gov.tw/uploads/files/202209/483dc333-70f3-4e2a-b337-0e8f059359ee.pdf>。

- 洪佳妤（2022）。〈金門縣師資培育制度評析〉，《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1(6)：90-94。
- 夏曉鵬（2000）。〈資本國際化與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 徐如奕（2022，5月23日）。〈犬貓數 295 萬首度超過 0 至 14 歲人口 立委籲設動保專線、補足人力〉。Yahoo 新聞網：<https://tw.news.yahoo.com/%E7%8A%AC%E8%B2%93%E6%95%B8295%E8%90%AC%E9%A6%96%E5%BA%A6%E8%B6%85%E9%81%8E0%E8%87%B314%E6%AD%B2%E4%BA%BA%E5%8F%A3-%E7%AB%8B%E5%A7%94%E7%B1%B2%E8%A8%AD%E5%8B%95%E4%BF%9D%E5%B0%88%E7%B7%9A-%E8%A3%9C%E8%B6%B3%E4%BA%BA%E5%8A%9B-080540860.html>。
- 翁碧蓮（2002a，1月21日）。〈未成年青少年生育 近年呈現明顯成長〉。金門日報：<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07359/>。
- 翁碧蓮（2002b，8月27日）。〈地區13%為老年人口全國排名第二〉。金門日報：<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09261/>。
- 翁碧蓮（2002c，8月29日）。〈地區獎勵婦女生育已發出二千多萬元〉。金門日報：<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09223/?cprint=pt>。
- 馬慧君、張世雄（2006）。〈變遷社會中的女性：一個生命歷程研究觀點〉，《國際文化研究》2(2)：60-99。
-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研究小組（2004）。《金門戰地政務的法制與實踐》。金門縣政府。
- 莊煥寧（2002，1月31日）。〈李縣長籲中央正視地區失業問題昨接見勞保監理委員會主委王三重一行盼從政策面支持地方落實離島建設條例繁榮金門〉。金門日報：<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07388/>。
- 許美玉（2009）。《前線女性在寶島：永和地區金門婦女生活研究》。金門縣文化局。
- 陳支平（2004）。《五百年來福建的家族與社會》。楊智出版社。

- 陳麗玉（2015，2月24日）。〈金門媳婦實難為〉。金門日報：<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4/250117>。
- 曾大千、陳炫任、蔡盈君（2014）。〈論教育政策之弱勢類別與其法制規範內涵〉。《彰化師大教育學報》26：73-96。
- 黃芳誼（2016）。〈從生命歷程觀點評析健康研究〉，《新社會政策雙月刊》(45)：54-64。
- 楊子江（2019）。〈財政統計通報(第17號)〉。財政部全球資訊網：<https://www.mof.gov.tw/download/21589>。
- 葉素惠、蔡文傑、李若松、吳永達、胡秀惠（2010）。〈我國政府機關政策執行成功案例探討：以金門地方特色產業為例〉，《T&D飛訊》(99)：1-14。
- 劉香蘭（2015）。《揭開臺灣照顧的多重面紗：個人生命經驗與社會政策的對話》〔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 劉香蘭（2018）。〈跨界前線：揭開金門人口紅利下的社會風險〉，《臺灣社區工作社區研究學刊》8(3)：35-98。
- 劉香蘭（2019a）。〈從前線到邊緣的轉折：金門的家庭變遷與家庭政策〉，《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5(1)：1-86。
- 劉香蘭（2019b）。〈誰來照顧：離島金門家庭照顧的十字路口〉，《東吳社工學報》(37)：1-41。
- 劉香蘭（2020）。〈性別的集體記憶：前線金門阿嬤生命歷程之生命位置分析〉，《靜宜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4(1)：1-32。
- 劉香蘭（2021）。〈一個家族、五個世代：金門吳家在馬來西亞百年征途的個案研究〉，《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25：15-64。
- 劉香蘭（2022）。〈「一國兩制」臺灣與金門：生於冷戰時期同代女性生命歷程分析〉，《臺灣鄉村研究》(17)：1-53。
- 羅志平（2010）。《金門行業文化史》。秀威資訊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 Aparicio, E., Pecukonis, E. V., & Zhou, K. (2014). Sociocultural factors of

- teenage pregnancy in Latino communities: Preparing social workers for culturally responsive practice. *Health and Social Work* 39(4): 238-243.
- Bengtson, V. L., & Allen, K. R. (1993).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pplied to families over time. In P. Boss, W. J. Doherty, R. LaRossa, W. R. Schumm, & S. K. Steinmetz (Eds.),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 A Contextual Approach* (pp.469-498). Plenum Press.
- Bonoli, G. (2007). Time matters: Post industrialization, new social risks, and welfare state adaptation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5): 495-520.
- Chiu, H.-C. (2017). *An island of floating world: kinship, rituals, and political-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ld war Jinm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Chiu, H.-C. (2023). *Visions of Marriage: Politics and Family on Kinmen, 1920-2020*. Berghahn Books.
- Dannefer, D. (1987). Aging as intra-cohort differentiation: Accentuation, the Matthew effect, and the life course. *Sociological Forum* 2(2): 211-236.
- Dannefer, D. (2003). Cumulative advantage/disadvantage and the life course: Cross- fertilizing age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58B(6): S327-S337.
- Dannefer, D., & Uhlenberg, P. (1999). Paths of the life course: A typology. In V. L. Bengtson, & K. W. Schaie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pp. 306-326). Springer.
- Elder, G. H., Jr.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lder, G. H., Jr. (1994).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7(1): 4-15.
- Elder, G. H., Jr. (1997). 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R. M. Lerner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1: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pp.939-991). John Wiley.
- Elder, G. H., Jr., & George, L. K. (2016). Age, Cohorts, and Life Course. In M. J Shanahan, J. T. Mortimer, & M. K. Johnson (Eds.), *Handbook*

- of the Life Course: Volume II* (pp.59-85).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Esping-Andersen, G. (2002).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Polity Press.
- Findlay, A., McCollum, D., Coulter, R., & Gayle, V. (2015). New motilitie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demographically-linked drivers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1(4): 390-402.
- Heinz, W. R. (2003). Combining methods in life-course research: a mixed blessing. In W. R. Heinz, & V. W. Marshall (Eds.), *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 (pp.73-90). Walter de Gruyter, Inc.
- Jaquette, J. S. (2003). Feminism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5(3): 331-354.
- Kelley-Moore, J. A., & Lin, J. (2011). Widening the view: Capturing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in studies of ag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R. A. Settersten Jr., & J. L. Angel (Eds.), *Handbook of Sociology of Aging* (pp.51-70). Springer.
- Kohli, M. (2007).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Looking Back to Look Ahead.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3(4): 253-271.
- Kok, J. (2007). Principles and prospects of the life course paradigm. *Annals Demographie Historique* 113(1): 203-230.
- Krüger, H. (2003). The life-course regime: Ambiguities between interrelatedness and individualization.” In W. R. Heinz, & V. W. Marshall (Eds.), *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 (pp.33-56). Walter de Gruyter, Inc.
- Krüger, H., & Levy, R. (2001). Linking life courses, work, and the family: Theorizing a not so visible nexus between women and me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6(2): 145-166.
- Lareau, A. (2000). Social class and the daily lives of children: A stud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hildhood* 7(2): 155-171.
- Liu, H.-L. (2020). Diverging from the normal path: The life course of an elderly woman in Kinmen County.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6(4): 423-443.

- Marshall, V. W., & Mueller, M. M. (2003). Theoretical roots of the life-course perspective. In W. R. Heinz, & V. W. Marshall (Eds.), *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 (pp.3-32). Walter de Gruyter, Inc.
- Mayer, K. U. (2004). Whose lives? How history, societies, and institutions define and shape life course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1(3): 161-187.
- Mayer, K. U. (2009). New direction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1): 413-433.
- Michael, J. S., Mortimer, J. T., & Johnson, M. K. (2016). Introduction: Trend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M. J. Shanahan, J. T. Mortimer, & M. K. Johnso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Volume II* (pp.1-2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Payne, M. (2005). *Modern Social Work Theories*. Palgrave Macmillan.
- Settersten, R. A., Jr. (2003) Age Structuring and the Rhythm of the Life Course. In J. T. Mortimer, & M. J. Shanaha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pp.81-98).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Shanahan, M. J., & Mortimer, J. T. (2016). Introduction: Life Course Studies. In M. J. Shanahan, J. T. Mortimer, & M. K. Johnso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Volume II* (pp.1-26).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Winters, L. I., & Winters, P. C. (2012). Black teenage pregnancy: A dynamic social problem. *SAGE Open* 2(1): 1-14.

“New Kinmen (Quemoy) Crises”? Intra-Cohort Analysis on Kinmen Female Life Courses Who Born in Post-Cold War Period

*Hsiang-Lan Liu**

Abstract

Since 1992, the tourism and service industries have been the main economic drivers for Kinmen's survival. Recently, issues such as no marriage, late marriage, and low birth rates, which are common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have led to the “New Kinmen Crise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based on cohort differentiation and multiple analyses, interviews ten women who were born between 1992 and 2002 in Kinmen. The specific oppression of Kinmen young women is captured in multiple analysis. On a macro level, the emergence of de-standardized life courses is embedded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context of geopolitics. On a meso level, labor participation based on education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female classes within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On a micro level, the male-inherit culture generates stronger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in capitalism society for young women, thereby they develop a collective resist to get marry. To response “New Kinmen Crises” requires sensitivity to the cultural effects within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gender contract.

Keywords: Life Course Study, Cohort Analysis, Kinmen Study, Women Study, Cold War Stud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Fugen Catholic University.
E-mail: liu2013220@gmail.com